

中医西传的源头——法国针灸之父苏里耶*

贺 霆

(云南中医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0)

摘要: 通过法国驻华外交官苏里耶的生平的介绍,描述“西方中医”的发生、发展,并讨论研究“西方中医”的重要性及正确方法。

关键词: 中医西传; 法国; 苏里耶; 人类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R24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2723(2013)02-0081-03

临床中医(针灸)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起源于法国,而法国的针灸又起源于昆明。法国外交官苏里耶·德·莫朗于 1906 至 1909 年在法国驻云南府(即现昆明市)领事馆任副领事期间,曾关注、学习、使用过针灸,回国后从 1927 年起向法国医生传授针灸临床技术,由此,西方针灸具备了可被观察的临床形态,并开始了从法国逐渐向整个西方世界的传播。

国内中医、医史界论及苏氏其人的文章甚少,且内容简单甚至错误。云南中医学院自 2010 年底开始筹办中医西传博物馆,2013 年成立中医西传研究所,在此过程中有幸采访多位苏氏后人及弟子,参照当地学者文章——特别是法国外交部档案馆资料,以及收集到的苏氏有关中医、针灸的著作、手稿及自制针具等,以多渠道、多层次将苏氏生平展现,希望给这段重要历史丰富细节、阐明意义。

1 苏氏生平

乔治出生于 1878 年 12 月 2 日,卒于 1955 年 5 月 10 日,享年 76 岁。他的中国、中医传奇始于 1886 年。这一年夏天,8 岁的乔治在假期中认识了一个旅法中国文人——丁敦龄,后者向其开启了东方国度神秘的大门,恐怕也是其日后选择学习中文的原因。乔治于 1901 年初被派往北京京汉铁路公司,同年 12 月被法国外交部特聘为汉口领事馆翻译,而后在上海、昆明(云南府)等地服务。1911 年 1 月回法国时,他的官衔是“副领事兼二等翻译”。中国学者在文章中一直把苏里耶回国时间定在 1927 年,

其实这是苏氏开始在法国传播针灸的年份。

苏氏这十年的中国经历对其今后“法国针灸之父”地位有决定性意义。苏氏在其 1939 年出版的《中国针术》(法文书名直译:中国针术;作者手书中文名:针灸法)前言中讲



乔治·苏里耶·德·莫朗

述了自己学习针灸的经历。他抵达北京不久,就遭遇一次霍乱流行,死者无算。他见有位杨(音译)医生能很快(用针灸)止住患者的吐泻、抽筋,于是,借助当局的介绍及自己流利的汉语,随其学习基本针法、重要穴位及脉诊,并获赠不少珍贵的医籍。两年后,苏氏转去上海,利用会审公堂法医及书记的身份,找到一位高明的针灸师张(音译)先生继续深造。后来在云南府(即昆明)有机会常去法国医院,并得到云贵总督锡良的帮助,结识了许多针灸师,受到中医正规训练。苏氏的家人、朋友、弟子也口述、撰文描写这段经历,除时间、地点等有出入,故事大体一致,只是增添其在昆明期间由于医术高明,众多愈者赠匾致谢,并集体签名授其“中医证

*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NO:12BGJ036)

收稿日期: 2013-03-20 修回日期: 2013-04-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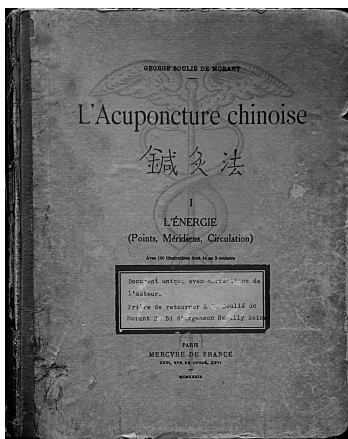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贺霆(1956~),男,广东汕头人。云南中医学院特聘教授,从事西方人类学和中医西传学研究。

书”,锡良因此赐其顶戴云云。

苏氏曾解释回法国后16年“不飞不鸣”的原因:当时科学派医生对他在东方学到的“怪异”医术均持怀疑态度,使其心灰意冷,于是埋头文学创作与汉学研究。直到1927年夏天在Bouboule市碰到Ferreyrolles医生,后者以顺势疗法为业,对苏氏所说各种疾病对应的针灸穴位很感兴趣,并耐心、谨慎地试用于临床,证明有效。于是将苏氏介绍给几位在医院工作的医生朋友(特别是MARTINY夫妇),当后者看到针灸令人吃惊的疗效时(苏氏称曾使瘫痪病人起立、行走),便要求他讲解该技能并节译易懂的古医籍。针灸术于是在法国医院里使用起来,医生们同时对此做了不少科学实验。

苏氏在其1934年的第1部针灸著作中写道,作为白人世界的首位传播者,6年来他终于使欧洲及北美从混乱与无知中解脱出来,懂得了中国针灸的真谛。5年后他的奠基之作《中国针术》第1册出版(图2),在扉页上他写道:“我将此献给医院的医生们,多亏我的工作,他们学到了针灸术并在巴黎4所医院公开施诊;献给众多法国以及外国的医生们,多亏这一传授,他们用针灸治愈了数以千计的患者。”苏氏也许用词不够谦逊,但他促成针灸在西方世界的复苏并迅速发展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以致那个时期以及不少后来的西方针灸医生均视其为祖师爷。他的名声也传到了东方、传到了中国:上世纪30年代就有上海针灸师将著作寄给苏氏,并在附信中表达对其的仰慕之情,1952年,当时的国家卫生部顾问、祖籍黎巴嫩的原美国医生马海德(即乔治·海德姆)将针灸研究所所长朱璉的《新针灸学》专门送给苏氏。

成名后的苏氏,一方面继续在巴黎医院针灸门诊与医生们一同施诊、讨论,一方面在自己巴黎西郊的住所接诊。据其外孙女Briens女士回忆,当时慕名而来者众多,且为头面人物。苏氏一直使用自己在巴黎珠宝匠处定做的两盒金、银针具,这套针具短且粗,尾部多镶有红、蓝宝石或



苏理耶所著《中国针术》第一册

珍珠,金针用来“补”,银针用来“泻”;苏氏这套针具及用法并未被其门生传承。苏氏借此收入加上外交部津贴及稿费、版税,维持一家生计。不过此举却令苏氏惹上官非,多次被控“非法行医”,控方为苏氏当年学生之一De la Fuye医生(其坚称所学非苏氏所传)。据苏氏后人及追随者称,苏氏健康因此恶化,中风数次,右侧偏瘫,却仍坚持以左手施术、著书,直至去世。Neuilly市政府为纪念苏氏在其故居设牌;其门生也集资为其铸像章;在法国糖果店,还曾附赠印有苏氏头像及事迹的卡片。苏氏与世界其它百余位名人一起被誉为“人道主义施主”。1952年苏氏获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提名(法国该年唯一一位被提名人),可见其影响力。

2 苏氏传奇的意义

苏氏留下的著作,直到今天还影响着西方针灸界甚至影响到其它“替代疗法”,2011年底笔者在法国南特市一位半退休的“正骨术(Ostéopatie)”术者诊所中,就见到其案头摆放着上述的苏氏《中国针术》。而风行欧洲的产科针灸,竟然是通过《中国针术》中片言只语的解读、发挥而成(特别是“筑宾”穴)。除这部长期被西方针灸界奉为圭臬的著作,苏氏还撰写过另外两本有关针灸的书以及大约19篇同类文章。

根据我们的访谈及收集到的实物、著作,可以对苏氏作出以下评判:

苏氏是一位外交官、汉学家及作家,他自述在中国的中医传奇大部分无法找到旁证,其中也许会有夸大之词,不过因此认为这段经历纯属虚构则有失公允。从他后来的临床知识、技能及所撰著作内容看,他在中国期间应该有机会亲身接触到当地针灸师并了解操作过程,因为苏氏所传针灸与该医术在中国实际的理论、实践基本相同,与西方19世纪的“针灸”则不可同日而语;

不管苏氏回法国前所达到的针灸水平如何,从1927年开始,在追随者的拥戴与催促下,他制造针具、示范操作、翻译并撰写针灸著作,无疑是西方针灸复苏的领袖。他著作中的叙述极具可操作性(针法、穴位、适应症等),大量引用《针灸大成》及《医学入门》章节,比较忠实于中国传统针灸,但不乏一些自己的发明,比如在五脏中引入“胰”,与“脾”并列;把三焦与“性功能”并列;适应症有“贫血”一节,专门讲述红细胞在针刺后的增长速率等。

通过对法国及欧洲历史、文化、社会全面的人类学观察,我们还发现:苏氏的重要地位以及他所

引发的西方针灸“复苏”,并不是中国针灸术发达的结果(当时中国中医、针灸正处低潮),也不是苏氏个人因素或其与感兴趣医生相遇的偶然因素,而是西方“新希波克拉底学派”思潮的需求:“活力派”对中医/针灸的“气”心有灵犀、顺势疗法注重观察症状、体症,与“辨证施诊”一脉相通。因此针灸从一开始便加入西方非主流医学阵营,并与其它“替代疗法”融会贯通,比如顺势疗法、正骨疗法、运动疗法乃至心理分析。同时,由于地理、文化及政治原因造成的东西隔离,使得苏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西方人接触、了解、学习针灸及中医的重要乃至唯一来源,知识空白、误读以及翻译习惯给西方文化自由解读、重塑中医留下很大的空间,并形成“西方中医”传统一直保留至今。

3 小结

以上事实说明,法国外交官苏里耶于1927年将在华习得的针灸术展示并传授与法国的医生同胞,西方的中医从此具备了临床意义及可被观察的形态,从法国向整个西方世界传播开来,并受到当地文化的修正,形成特色,是西方中医的源头。直到上世纪70年代前,西方人主要根据自己的品味和理解来塑造西方中医,与同时代中国本土的中医关联甚少;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与中国周边地区有很大不同,与非洲、拉丁美洲也不同。“西方中医”传统今天仍然主导着西方居民和中医有关的观念与行为,因此值得成立专门的学科加以研究,特别值得中国学者从人类学角度将其作为本土中医的“他者”来研究,即:超越临床疗效、科学道理、中国血缘等评判,去分析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医与当地社会文化环境的吻合度,阐明西方居民解读、重塑中医时所借助的特殊文化资源,从而理解、欣赏与中国本土不同的中医形态,并反观自我,消除潜在的文化冲突,“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后记:有关“中医西传学”

“中医西传学”属医学-人类学交叉新学科,是通过人类学实地调查,描述传入西方社会的中医的

形态、历史、演变,揭示其文化模式,为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提供支撑;并以此反观自我,为中国本土中医发展提供参照。

“西方社会的中医”是指西方人根据中医传统,经过当地文化的解读而形成的“中医”。称“中医”,一是因为西方居民主观上认同其来源于中国,二是因为客观上其摹本为中医经典,同时其每一流派的始祖多少亲历中医诊疗过程。称“西方”,是因为长期中西方隔绝、西方强势文化及汉学传统,舶来品中医在当地被改造,其形态已不完全同于中国本土的中医。“中医西传”迥异于中医向其它地区的传播,且内容丰富,值得也必须作为单独学科开展多方向研究。同时,由于西方社会目前的特殊地位,有理由对“中医西传”给予更多关注,因为这是中医走向世界的关键。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是以往历史学、传播学的文本研究所不可替代的。

通过去西方社会进行实地人类学调查研究,深入访谈西方中医的载体——当地居民,并参与他们有关中医的活动,以详实的第一手资料,使目前散在于史学、传播学中的有关西方中医的知识得以整合为独立学问。长期(每项课题至少一年)参与性观察与深入访谈使我们能够:①突破文本研究,以第一手详实资料使“西方中医”更真实、完整;②突破文化中心主义视角,从西方居民的角度去理解“西方中医”存在的合理性,赋予原来被轻视、鄙视的“西方误读”以建设性意义;③突破中国本土中医研究思维、方法框框,以西方中医为鉴反观自我。这是本学科研究方法上的特点。

综上所述,本学科在内容上、方法上及目的上都突破了以往所有的同类研究的思路。其意义一是填补了中医研究的空白;二是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供支撑。这样一个崭新的学科难免会引起疑问:“西方中医”是否存在?是否能够成为学科?是否值得采用人类学方法?本栏目将通过系列文章,回答这些问题。

(编辑:徐建平)

George Soulié de Morant: Origin of “Western Chinese Medicine”

HE Ting

(Yunnan University of TCM, Kunming Yunnan 650500)

ABSTRACT: This is the first article in the “Western Chinese Medicine” research series. This piece, based on the life story of the “father of French acupuncture”, introduces the beginnings of the “Western Chinese Medicine” tradition, its importance and the way in which it should be studied.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West; France; Soulie; Anthropology